

生活在他方

——重读路遥的《人生》

◎ 黄文倩

(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系)

生活在他方，学生们写在索邦大学的墙上。是的，他深谙此理，正因为如此，他离开伦敦远赴爱尔兰，因为那儿的人民正在起义……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他方》

内容提要：

本文重新解读《人生》，将此作同时存在的主人公及作者的声音，视为合理且不可分割的结构，并在此假设下，重新分析作品中的1980年代初农村基层知识分子的心态、社会意义及其叙事的功能/价值。同时，为了突显其特色，本文引入日据时期同样亦具有“生活在他方”特质的龙瑛宗的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来加以参照解读。

关键词：

路遥、人生、心态史、乡土中国、现实

一 前言

大约在2008年，透过当时在台湾清大客座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贺照田先生的介绍，我第一次读到了大陆内地作家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读第一遍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跟我过去所读到的“右派”世代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作品，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也跟我读过的“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很不同——当时主观上觉得，其作更有一种黄土地的大器与气魄。尔后，我才开始完整搜集路遥的各式作品与相关评论，并于2010年的夏天，亲自到路遥所曾念过的延安大学、延川中学及他的老家延川考察，拜访了当地的县志相关人员，见到了路遥的另一个农民弟弟。然而，当我第一眼看到路遥七岁过继给伯父后，所生长与居住过的窑洞和周边环境时，还是深深地感到惊讶，某种不带价值评价的意义来说，那确实狭窄且贫脊，在2010年的夏天，附近也依旧是野草漫生与黄泥路，当然，是很有生命力一种。从此，我也才真正开始起了想深

入理解路遥及其作品的兴趣。

第一次读《人生》的时候，我便感觉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红与黑》式的叙事，虽然很多的内地的评论者，包括路遥本人，都直接在《人生》及《平凡的世界》中互文地引用《红与黑》，但事实上，人生中的高加林，本质上跟于连（台湾的桂冠版《红与黑》主人公翻译为朱立安）完全是两个不同历史观和社会体制下的主体。高加林生长在可以说是第三世界的乡土中国，他的文化性格和行动模式，一方面有着自古以来传统乡土中国的历史基因与文化因袭，二方面更深受新中国建国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及渗透。当文革结束，体制开始重新允许“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便力求离开乡土中国往外发展，这样的道路跟西方的成长与情感教育的小说模式，虽然在大框架上有相近处，但本质自然是不同的，他日后的成功、受挫与失败，也只有从他自身的社会与历史才能寻求更合理的解释；于连（朱立安）则不同，他的向上层发展之路，从性质上应该更接近的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图反抗强势宗教，亦求个人问达（舍他者、女性、

社会甚至教义)欲望的实现。

然而,别有意味的是,在我查阅了相关的《人生》评论,尝试融入过去对高加林这种具有乡土中国特殊性的主体的分析后,我感觉仍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以提出来讨论。不完全是批判式的,高加林式的人物,无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或当下两岸,当然有需要被批判的地方,例如曹锦清早在1980年代初就批评过高加林:

当个人愿望与社会分工发生矛盾时,青年应该愉快地服从社会分工,在规定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但他始终没有把改造落后农村的任务当作终生的光荣使命。这使他不可能建立与广大农民的深厚感情,把生活建筑在想入非非的幻想之上,造成自己在生活信念方面的软弱。¹

但是也正如雷达的评论:

他有强烈的进取心,有冲破偏僻农村中的封建愚昧残存、向往科学和文明,发展才能和抱负的追求,另一方面,他自身又有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严重弱点。他虽然是农民之子,但他的土味后来几乎被冲洗光了,变得轻飘飘的了。他的追求,他的性格和灵魂与客观环境产生了激烈冲突,而这一悲剧冲突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的。²

延伸雷达的观点,我以为高加林式的冲突和命运,一方面自然是他个人性格与价值观的限制,但更多的应该还是源于彼时社会、历史和政治条件的制约。然而,这当中可能需要重新展开的环节,包括:对于乡土中国,是不是一定全然要从所谓的“封建愚昧”来理解?封建,就一定愚昧吗?这样的概念在近百年西化的过程中,似乎已经惯性地联系在一起使用,这样是否遮蔽了一些诠释视野及细节?在这种假设下来理解人物,是否也会形成另一些偏见?因此,我想提出来重新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路遥在《人生》中(他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亦然),都有很明显的作者介入叙述、给出说明或判断的现象?该如何更合理地解释这样的叙事模式,而不简单地认为“作者介入叙事”就一定不好?它们究竟在作品中发挥了什么功能?具有怎么样的现代性意义?高加林和作者路遥,又用什么样的心态,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感觉结构来响应他的社会?我认为这些提问,对于今日两岸的社会问题,也仍有一定辩证意义。

二 第三世界小知识分子叙事:

陈有三与高加林二元对立姿态的发生及后果

如果首先从抽象的框架上来谈,在社会转型阶段、城乡发展交叉点,文学世界和现实人生里,像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人其实非常普遍,用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名《生活在他方》为比喻,他们对既有的生活不满足,无论在精神和实际行动上,总是努力活在他方,只是高加林是一个特别敏感、状况特别极端的个案,因此各种矛盾都会体现在他的身上。无独有偶,台湾日据时期的代表作家龙瑛宗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1937年)也曾塑造出类似的角色:陈有三。我认为

他的心态史,或者说感觉结构,其实某部分非常接近高加林(当然因其历史社会背景,而也有许多的不同,容后再分析)。

陈有三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有为青年,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期间,他非常幸运地进入一个小镇中的街役场(即今日之镇公所)担任基层的会计助理的工作。由于刚从学校毕业,涉世未深,仍然相信能够以个人的才能、才华与努力来改善自己与社会的问题,因此在最初工作的时候,他仍然抱着要向上奋斗的理想:“他立志在明年之内要考上普通文官考试,十年之内考上律师考试”³。但同时,虽然有着这样那样实用功利的向往,但陈有三并不纯粹只是一个追求私利式的个人主义者,跟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如《红与黑》的主人公或《嘉莉妹妹》中的嘉莉为了个人前途或利益等目的不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陈有三也仍有着想靠着个人式的努力,最终“贡献于人类福祉”的愿望,小说这样叙述:

他在中学时代读过的书,除了教科书之外,便是修养书,伟人传,成功立志传之类。这些书里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出身贫困、卑贱,经过任何的荆棘之道,才积成巨万之富,或成为社会的木铎,贡献于人类福祉。这些成功的背后,只有渗血般的努力。(底线为笔者所加)

这样的陈有三,活在日本统治台湾的背景下,在小说刚开始,他的世界观中并无阶级、殖民及被剥削等的概念与视野,有着的只是高度认份的刻苦与自我要求的意志。然而,为了提早达到他内心的目标,他也跟着身边的资深同事与朋友一样,以为凡存在就合理,也轻易地倾倒在日式的生活与价值观,对自己脚下的台湾乡土社会,也因此抱着持高度的嫌恶感。在陈有三眼里,台湾乡土社会生活,跟日本式的“新”生活,处处充满二元对立的张力。

例如,小说中出现小镇上的台湾人的房子,与日本人的住宅就呈现了这样的差异:

街道污秽而阴暗,亭仔脚(骑廊)的柱子熏得黑黑,被白蚁蛀蚀得即将倾倒。……并排的房子更显得脏兮兮地,因风雨而剥落的土角墙壁,嫌窄地压迫胸口;小路似乎因为晒不到太阳,湿湿地,孩子们随处大小便的臭气,与蒸发的热气,混合而升起。⁴

日人住宅舒畅地并排着,周围长着很多木瓜树,稳重的绿色大叶下,结着累累椭圆形的果实,被夕阳的微弱茜草包涂上异彩。⁵

台湾式的乡土感官联系上的是又脏又臭,而日式住房的感觉,却能饱满并充满异彩。这样嫌弃乡土台湾小镇生活的陈有三,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被异化,继续努力力争上游,学日文说日文,穿日本式和服,带着虚荣的心,以不同于本岛人的优越感的姿态及心态,观看着其它台湾同胞,也跟他的同事一样,默默地期望有一天能住到日本人的住宅里,甚至娶一个温顺的日本妻子。在他看来,台湾人、乡土社会下的台湾小镇的生活和习俗的水平都极为低下,令陈有三不耻:

吝嗇、无教养、低俗而肮脏的集团,不正是他的

同胞吗？仅为一分钱而破口大骂，怒目相对的缠足老嫗们，平生一毛不拔而婚丧喜庆时借钱来大吃大闹、多诈欺、好诉讼及狡猾的商人，这些人在中等学校毕业的所谓新知识阶级的陈有三眼中，像不知长进而蔓延于阴暗生活面的卑屈的丑草。陈有三厌恶于被看成与他们同列的人。⁶

在这样的日据时期的背景下，陈有三毫无政治自觉的个人发展与追求只能是一场悲剧，尽管他的追求中，如上所述也带有“贡献于人类福祉”的理想，但社会和历史，都不可能以他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当时间不断推进，在能动性极有限的生涯与生活里，陈有三也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各式的身边同事、朋友的口中，听来与看到更多实际的“现实”——作为最基层工作者的本岛人，待遇远远低于日本人，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经济状况只能愈来愈雪上加霜，而乡下小镇格局甚小的生活，也使陈有三时常摆荡于要不要向他其它的同事朋友一样，上酒家与女子调笑喝酒，以求放松。终究，在日积月累的保守及无发展的氛围里，他的心态也开始转变，他甚至想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清纯美丽的本岛台湾女子结婚，希望以获得一种爱情及个人式的平稳生活，来达到新的精神上的平衡，然而，他还是再一次地被彼时台湾社会所击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早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服从资本主义及殖民强权社会及阶级的逻辑，仍然要嫁一个更有经济件的富豪，不可能嫁给虽有理想但一无所有的陈有三，陈有三此时的信念才全然幻灭，他嫌弃本岛的台湾乡土社会，想学做日本人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最终也仍因为自己终究属于本岛人的一份子而被嫌弃，在经济和种族/族群上，他都是属于最下层与弱势的一方。

相对于陈有三这种活在殖民体制下的小知识青年，高加林其实有其幸运，高加林生活与成长于新中国的乡土环境下，虽然经济一样很困窘，但自1940年代以降，在毛泽东强势领导的工农兵文艺论述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运作与实践下，“主人”的主体性/当家意识，始终存在于新中国建国以降的作家作品中，同时有着较强健的声音——而这一点正是最不同于同样处于弱势社会经济条件，但过于受限于殖民体制下的台湾作家、作品的条件差异。这种“主人”的社会主义主体性，反映在高加林身上的特质，首先是他非常刚健且强悍的文化人格，而在黄土地上的生长与经验亦更加乘了其力道。然而，他跟陈有三又有相近的地方——他们不满于眼前当下的生活，高加林的才华、能力和苦干实干的特质，都让他更渴望生活在他方，从当民办教师、省城的通讯撰稿员，到后来舍弃巧珍跟黄亚苹在一起，甚至提到连联合国都想去，他的理想视野开的很大，虽然当中充满虚妄的特色，而实践起来似乎也颇有气魄，如果不是有着充分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一个极为弱势的底层的小知识青年，要仅仅凭借个人特质而生产出这种强悍的文化人格，是难有说服力的。

然而，在我看来，高加林最大的矛盾与困境，也

仍然是来自于同一个母体的另一面：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挫折。反映在具体现实问题上，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底层，无论就经济及生活的条件，都离温饱富足仍有不算短的距离（2010年笔者到延川考察时，当地为副县长开车的小青年也还跟我们说，电力也仅仅是这二年才开始有），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在毛时期的重工业发展，为日后中国的长期崛起奠定了基础条件，也有其进步性，但底层农村的贫瘠、基层官僚的腐化的现象，以及改革开放后所释出的新发展的可能性等，都在在召唤出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及新的主体的到来。

从小说中来看，路遥并没有赋予高加林更彻底充份的反思能力——至少，正如前文的分析，高加林出走的力量与文化人格上的张力，其实也仍来自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才能够有那么强悍的奋进性与实践力，也惟其当时眼光较有限，亦才有蛮干的勇气。然而，尽管再怎么努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再度转型的阶段，他的发展却受限于另一种体制（包括不得不以开后门的方式取得机会），也才正彰显了更多中国社会主义受挫折的问题。尤有甚者，《人生》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高加林，明明出身乡土中国，却对作为一个农民抱着高度耻辱感，念念不忘的，总是他曾接受过的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式的中学教育、担任过民办教师，而且不只是高加林，就连作为农妇的巧珍，骨子里也对农民带有明显价值高低的判断。对高加林来说，省城、城市优于农村；对巧珍来说，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优于农民，这是在小说一刚开始出场就已经设计好的意识倾向，因此高加林看待农村与农民的眼光，除了对他的父母之外，也都充满着像陈有三般二元对立的下的不耻，小说中有多处这方面的心理书写：

他十几年拚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⁷

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他看。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⁸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在于，偶尔为了维持一己尊严（或更通俗有力的说法：面子）的高加林，过于敏感又受到刺激时（例如小说写到高加林在车站，遇到了昔日曾为同学，今日已在县城有工作的黄亚苹和克南），他会隐藏自己真实对农村和作为一个农民的耻辱感与态度，转而以文艺青年又兼有社会主义主体的方式，说出“不是有一个诗人写诗说：我们用锄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吗”⁹来自我维护。事实上小说中的高加林，甚至是作者路遥的美学立场与态度，很明显地仍比较重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发展，而非现实的“细节”性。这是为什么高加林要如此投入现实，并在当中，力求跟上所谓现代化的生活

的原因，但他的心态发展跟陈有三不同的地方是在于，陈有三至始至终都很内敛，尽管外表可能不太动声色，但随着工作、经济和感情发展的理想性愈来愈空无，陈有三无力扭转与改善日本殖民体制的制约，内心才开始愈来愈痛苦，甚至产生虚无无力的倾向，正如施淑对龙瑛宗及《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作的评析：“创作经常在自然主义滞重阴郁的底调上，透露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无力感及东洋风的纤细灰色调。”¹⁰

但高加林不是这样，他毕竟是在具有“主人”特质的中国大陆发展工作与感情，虽然有挫折，但还可以继续容忍与寻求克服之道。这种克服之道，落实在小说的叙事操作时，就是路遥对全知观点的掌握及不时的介入评析，甚至到最后，作者路遥的声音已经大过于主人公高加林的声音，路遥最后安排高加林仍然回到农村，并且让高加林对过去的虚荣与虚妄的“现代”追求有所反省，无论这一点从高加林的心态发展与立场来说是否合理，重点是作者路遥刻意作了这种安排的意义——路遥显然认为，那个阶段，选择检讨读书的虚妄，回归黄土地与黄土地上爱他的亲人们，才是较好的选择。同时，高加林的农村朋友亲人们，也未必会坐视他的才华的浪费，小说最后让巧珍叫马拴帮忙，让他去跟高明楼求情，而高明楼本来也就不希望高加林留在农村威胁他的地位与领导，因此暗示了日后高加林仍有机会再离开农村，继续去追求“现代”式的生活。在这层意义上，路遥（作者）声音的介入。路遥安排的其它角色对农村主体性的表述（例如马拴的幽默与务实；克南的真诚、善良、实在与稳重；巧珍在被高加林抛弃后，仍执意好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的勇气等）跟高加林的关系，可以说都是一种终结——终结小说前半段高加林过于二元对立地观看农村与城市的意识，还给不同人生追求的多元及平等价值。

三 他方有退路——高加林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及出路

无论学习的对象是苏联或英美，西方式的现代教育模式取代中国自古以来的私塾教育，也仅仅是近一百年来事。对于一般人民群众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应该主要是在于提供了更多相对平等的受教机会，将过去只能在贵族阶级的教育权，解放出来让更多相对弱势的阶级参与。然而，这样看似“平等”的空间，对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基层小知识分子而言，也是许多社会复杂矛盾的来源。

台湾日据时期的陈有三正是如此，学校所教的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理智思辨，让他很快地成为一个文艺青年，知识让他获得了新的小小的工作机会后，成了一种新的虚荣，以为能够继续以有毅力的读书、考试等努力之路，脱离台湾乡土小镇、脱离在日本统治下低薪的命运，眼里开始容不下未能接受过新式西化教育的乡土人民，小说中曾这样写到此主人公跟新式知识间的虚荣共生关系：

陈有三唯有拥有新的知识才感觉一种矜持，才能

够俯瞰群众于他周围的同族们。要他放弃新知识，简直就是令他还于被某些人所鄙视的同族。要把他撞落于没有教养而生活水平低得如同泥沼的生活，对他而言，是无法忍受的。¹¹

然而，这样的优越也只能是一种个人式的优越，在日本殖民统治体制下的陈有三，只能从事最基层的工作，工作内容远远比自己所想象的要来得单调，尽管他仍然有着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但也敌不过出社会更早的中学同学的现实功利想法的影响，例如，在小说中，陈有三跟他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廖清炎有一段对话，能充份看出，当社会还没有全面发展到健康成熟的阶段，第三世界过早进入现代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不上不下的生活和精神困境：

知识把你的生活搞的不幸。你无论如何提高知识，一旦碰到现实，那知识反成为你的幸福的桎梏吧。再说，在这乡下准备律师考试什么的，没用的啦。¹²

尽管陈有三原本也不愿意认同社会、小镇的腐化，他被动的文化人格亦间接地将他往颓废的方向推，再加上物质（薪水）基础远远不足支撑精神理想，因此在小说中，龙瑛宗曾藉其中一个配角林杏南的儿子发言，提到他也想追求“进步”、甚至想读《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的起源》、想读鲁迅的《阿Q正传》、高尔基的作品及穆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等，都足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左翼文化背景与资源，但林杏南的儿子也是最下层的台湾人民，毫无金钱能力，连上述书籍都没有钱买，最后只得因身体过于虚弱而死掉。而陈有三，在目睹了“前人”的这些“人生”后，他当然无法生成具有抵抗力的主体，因此与最终只能走向虚无与颓废：

抛弃所有的矜持、知识、向上与内省，抓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沉的颓废之身，恍见一片黄昏的荒野。¹³

然而，在陈有三的参照下，高加林的未来却并没有走向颓废、走向虚无。就接受西化教育的影响的程度下，高加林无疑地比陈有三更为“洋派”，小说中的许多感官书面，都充满着西化的意象及想象，例如被观看的现代裸体、听到的小提琴的乐声，甚至高加林之所以会喜欢上巧珍，某种程度上，亦是投射了自己所喜欢的苏联油画的形象，而似乎都不是真实的对象本身，下面的片段很让我印象深刻：

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高加林活动了一会，便像跳水运动员一般从石崖上一纵身跳了下去，身体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就优美地投入了碧绿的水潭中。他在水里用各种姿势游，看来蛮像一回事。……水声听起来像是很远，潺潺地，像小提琴拉出来的声音一般好听。¹⁴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

庄稼地，地面的一条小路灵，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¹⁵

同时，这样的现象也不只出现在高加林身上，路遥笔下的小县城女知识青年黄亚萍亦如是，她对高加林的感情，建立在一种他方的理想与想象上（将高加林想象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而他们的谈话内容，基本上也脱离实际的日常现实，尽是遥远抽象感觉高尚的小说、绘画甚至国际问题，当然，并不是说高加林和黄亚萍这样的年轻人不能讨论“他方”、精神或理想之类的东西，而是高加林对随后出现的巧珍谈及农村生活的不耐，可以在在看出高加林式的人物，在超前地进入知识与现代世界后，重抽象而轻具体的倾向。

同样也很有意思的是，跟陈有三不同，高加林尽管深受西式教育，生活在他方，也可以说活的很虚幻、轻飘飘——而这一点乃是过去的论者批评过的，但我们也必需注意到，在《人生》中，路遥自己却也不时地介入他笔下的高加林的思想世界，介入并点出（或早已看清）高加林的虚幻不实，与其说这些是高加林的声音，不如说是作者的声音，例如：

他受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采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工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¹⁶

同时，跟陈有三的日渐颓废亦不同，整部小说中，高加林其实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进，对现实了解的深入后，因生活在他方而导致他个人生活理想（自然也包含了他实利的追求）及精神追求的动机与力量的降低，相反的，他每一次遇到了乡土社会人情官僚所带给他的挫折，例如小说一开始高明楼为了儿子的工作，换掉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工作、别人为了讨好他的叔父让他走后门参与县城的通讯员的工作，以至于最后因牵涉到黄亚萍和克南的爱情而被报复等，他都能够快速地恢复对现实的认识与理智，冷静地面对即将来临回到农村的“下场”，这种快速回到“现实”的能力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也能间接地说明，或许当高加林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虚幻地爱上巧珍和黄亚萍（及其投射物或现代象征）、虚幻地讨论远在他方跟乡土中国毫无直接关系的一切（例如与黄亚萍不时讨论能源与国际问题），也仍然可以作为他继续往上向前的动力，务“虚”对他而言也有“实”的作用，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动力。他毕竟是在自己的母土上接受新一波的“现代”式教育，如果不是因为中途高加林“走后门”的事件被告发，就小说的脉络来推论，就高加林的乡土亲人邻人对他的支持，以高加林的能力，他还是完全有机会落实他昨日虚幻的“现代”理想的，未若如陈有三般被不知不觉异化与自抑。

总的来说，尽管《人生》中曾藉高加林的父亲之口，

批评高加林“硬是书把你看坏了！”但路遥也藉另一个角色德顺老汉的声音，说出“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¹⁷ 当有母土、有底层的乡土亲人、有不教条的集体资源与力量的背景条件时，路遥似乎认为，像高加林这样深受现代化教育影响的青年，虽然有其虚妄处，然而只要条件到位、水到渠成，他最终还是能克服其虚妄与挫折，继续、也应该有其更大的前程及发展。

因此，如果归纳一下《人生》这种或隐或显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声音同时并存的现象，可以这样理解：在一些西方小说的文艺观中，认为若作者的声音介入作品，便会影响整部作品审美的独立性与效果，其意义多是负面的。然而，这样的标准究竟适不适用于我们第三世界及两岸 20 世纪以降的文学诠释，其实仍然要落实到具体的个案分析才有意义。我认为，就《人生》来说，作者与主人公声音并存的现象仍有其明显的价值，一方面，它是一种解消城乡二元对立意识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克服西化教育与现实落差下，对乡土与集体价值的再肯定与指引。二者的功能都求“载道”。无论当时它给出的结尾“回归乡土”是否有其说服力，它毕竟是作者的一种文学立场的自由选择——这终究应该要被尊重。而也正是在这种双层的意义上，高加林和作者的声音并存的双声现象，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发展建构具有乡土中国主体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史观的重要一环？仍有待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注释：

- 1 曹锦清：《以“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收入雷达主编：《路遥路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 2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收入雷达主编：《路遥路究资料》，第410页。
- 3 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收入施淑编：《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选》，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第213页。
- 4 同上，第203页。
- 5 同上，第208页。
- 6 同上，第214-215页。
- 7 路遥：《路遥文集·人生》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 8 同上，第20页。
- 9 同上，第23页。
- 10 施淑编：《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选》，第251页。
- 11 同上，第233页。
- 12 同上，第230页。
- 13 同上，第249页。
- 14 路遥：《路遥文集·人生》第1卷，第16-17页。
- 15 同上，第39页。
- 16 同上，第42页。
- 17 同上，第199页。